

和医院，协和医学生协和老师，反正就是这些。它一共使用了 50 多次，占总共使用次数达到了 1/6，为什么会报刊上出现这么多协和呢？当时我考察了 26，27 年最多的，又是和当时的大家都知道的梁启超住院，这个人物，因为他在整个晚清到民初，他不论在政治、言论，报刊界是最有影响的。他住院以后就造成一个医疗事故，很多人就发表评论。我发现很多 26，27 年的话，我这里就引了很多当时反驳陈茜滢的一个讲话。讲话就说梁任公先生在协和医院就医，结果血尿症没治好，反而还割掉了一个左肾，拔去七颗牙齿，挨了好几天饿。然后，她后面就提到了这些闲话对西医，尤其是协和，她没讲医院，大肆攻击，为不该拿人做实验品，并与中医大有拳拳之意。所以她这一小段话出现了三次，这个协和有一次是指协和医院，其它 2 次就是用协和来指称这个协和医院，她就不用协和了。实际上，“协和”这个词后来在人们的习惯用语中就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就变成一个词协和医院了。我从我这个数据库里头提出例句来看的话。有 26 年到 27 年使用了 40 多次，全都是和协和医院有关，那么好了我就不讲了。我最后再讲一点，就是这个“协和”，实际上它的这个意义是泛化了，“和谐”它意义是窄化了，所以实际上和谐这个词来取代协和是个必然的现象。我研究这个现象的目的不是要讲这个语言现象，我是要讲出来它和文化转型的关系，因为这些现象都是发生在第一次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转型当中。这个里头和谐当时直接冲击儒家的两个观点，就是全盘反传统的思潮里头，就是实际上冲击到家庭观和天下观，都是一个抛弃的对象。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太讲，实际上中国传统的和谐观我概括了两个要点：一个它是要以儒家作为判定是非的最终标准，第二它都是有中心的，在夫妻关系中是以丈夫为中心，妻子要有妇德，在天下关系中，以中国为中心，其它是教化的。所以它是

个等级次序结构，才能实现一种和谐，它强调这个。所以我刚才讲宋献方先生他讲的这个和谐观里头是不是考虑到儒家的这个等级次序和以什么为标准，才能做到和谐。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是以阶级观念，用平等观念来，通过阶级斗争来达到一种平等观念，来达到一个未来的理想的和谐状态，是共产主义。到了毛泽东时代发展到了顶峰，到文革时候那完全是个斗争，所以今天的和谐观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个否定。但是我认为现在的和谐观到今天提出来又是在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上再一次提出来正因为社会上有很多不和谐的。这时候有很多人，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真空里头，怎么来，就是说你这个传统和谐观背后的价值，是儒家的呢？还是有中心有等级次序的呢？这个里头，实际上现在很多人对儒家又来复兴的时候，作为一个和谐观的填充剂，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还是需要回到宪政的架构。

○座長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今の金観濤先生と劉青峰先生は、概念史という方法で、中国の歴史上の概念に関する膨大なデータベース(データベース)を研究されています。1830年から1940年ぐらいまでの長期間にわたる、歴史上の諸概念の膨大なデータベースを作成し、それを使って概念史の研究をされています。その研究の一端をうかがう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かと思えます。

では、続いて許紀霖(XU Jilin)先生です。タイトルを申し上げますでしたので、許紀霖先生の報告タイトルを申し上げます。「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与宗教复兴:現代中国の精神危機と宗教の再興」というタイトルで、報告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現代中国の精神危機と宗教の再興」 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学）

谢谢加加美教授！在昨天的综合讨论里面，我已经初步提到，建立和谐社会不仅是利益的和谐而且包括价值的和谐，今天我的报告讨论的问题是：

中国经济发展以后，我们这三十年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这是一个

类似日本 COE 的机构,是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基地。在 2003 年到 2006 年,我们承接了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主题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主要对全国三十个城市的 4569 个样本进行了社会学抽样调查,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做了一些综合性的考察和分析。今天我将借助一些抽样调查的数据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题,是关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今天中国有没有一个价值观?对一般的中国人来说,可以说没有也可以说有。如果说有的话,今天一般的中国人那里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所谓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我非常赞成昨天下午张玉林教授的提问和发言,他说现在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发展主义的,而一般民众信仰的是物质主义。这一上下结合就形成了一个物质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以工具理性的普遍化的量化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和一个个人是否成功,整个是一个量化的指标。所以各地政府都追求 GDP,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普通老百姓看一个人是否成功,也有一套指标,就是看他开什么车,住多大的房子,穿什么样的名牌。这都是以物质性的占有指标来衡量某个人是否幸福。但是我们都知,一个人是否幸福与他占有了多少物质没有必然的关系。往往是占有的越多,幸福感越少。因为与他的不断膨胀的欲望相比,他所得到的东西永远是有限的。不丹这个亚洲高地小国提出了国民的幸福指数,他们认为不丹虽然小,但国民幸福指数是全世界最高的。

今天中国所存在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是一套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但是,这套意识形态并不具有正当性。它不能写进宪法、法律,也不能写进教科书。它不是大道理,只是一套“潜规则”,这个概念是北京的吴思先生在研究明代历史时发现。中国社会里面人们遵从的不少规则未必是被制度化了的,写成文字的那种,而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一套“潜规则”。中国现在有很多潜规则,甚至还有“潜伦理”、“潜价值”。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就是“潜伦理”和“潜价值”。然而,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流行,另外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更充满着焦虑感。自杀率在提高,我们的调查数据表明,一方面人们用物质主义来衡量人生,另一方面对生活意义充满了焦虑。生活意义的问题,有 27%的人是经常考虑,有 45.5%的人偶尔考虑,两类加起来

将近四分之三。也就是说,一方面大家非常注重对物欲的追求,但另一方面有深深感觉到精神的虚空。活着到底为什么?这个问题非常突出,这是宗教复兴的一个心理空间。

第二个问题,是核心价值的失落,今天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社会要有一些被大家所遵从的主流核心价值。但是今天中国社会关于这些核心价值,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模糊。在我们的调查里面,有一个问题,问是否同意这样一个看法:人们的价值观各不相同,没什么好坏对错之分?结果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肯定了这个说法,认为价值观没有什么好坏对错之分。这是一种典型的价值相对主义。很能说明今天中国公共价值的丧失。中国目前提倡法治国家的建设,中国的确需要法治。但是我们也看到,按照现有实存法的数量来说,中国大概是世界上法律最多的国家之一,但中国人却缺乏法治精神,比如说随便穿马路,不遵守交通规则比比皆是。法虽然有了,但是要使一般国民遵守法,还需要大家共同遵从法背后的那套价值和法的精神。

不能说中国人现在没有伦理道德,一般人还是有起码的伦理价值观,问题在于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把这套伦理价值观相对化、实用化了。今天在中国扮演各种角色的时候,最难的是扮演父母的角色,因为你对孩子的教育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们要对小孩子说很多大道理,告诉他们要做一个好人;但另外一方面,一讲到具体的问题马上提醒小孩子不要太天真,外面大灰狼很多,不要随便去做好事,今天中国的小孩子,由于在基本的道德观上非常模糊,他们往往形成了双重人格。在考试的时候他们都会背一套大道理,这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另外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之中,由是被各种小道理支配的。在今天中国,做坏事有时候比较容易,因为惩罚机制并不那么普遍,反而做好事比较难。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去年在南京发生的一个对全国影响比较大的案子。有一个年轻人从公交车下车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太太跌倒了,就把她扶起来,看到这个老太太伤得很厉害,又主动联系儿子一起送到医院,发现他们身上没带钱,帮他们垫了医药费,结果查出老太太跌成骨折重伤,老太太便大腿一拍:“就是这个年轻人撞的!”然后把这个年轻人告到了法院,要他承担医药费。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

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或旁证来证明是他撞的或不是他撞的，最后法院做了一审判决。判词中说：按照常理，如果这个年轻人没有撞这个老太太，就不会送她去医院，按照常理，更不会为她垫付医药费，因此，这个年轻人应该支付医药费的一半。这个判词出来以后，在全国引起很大的轰动。假如判词成立的话，就意味着从法律的形式上确定中国如今不可能有好人了，不可能有雷锋了。消息传到香港之后，香港报纸就提醒香港市民以后到大陆不要随便行善，看到老太太跌倒就把她扶起来有可能会惹上麻烦。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中国如今的核心价值观变得非常的脆弱。

宗教复兴就是在这一背景中出现的。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了一个重要数据，根据抽样发现，在中国年龄为16岁以上的大陆人口当中，有31.4%的人信仰各种各样的宗教。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具有宗教信仰的总人口在三亿人以上，这个数据由*China Daily*（《中国日报》）报道以后，在全世界引起很大的注意。几个大通讯社非常敏感，立即发通电报道，因为中国到目前为止官方承认的宗教人口的数据只是一个亿。但我们的调查已经发现现在已经达到了三亿以上，而且信教的人口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当然，中国的宗教非常复杂，有些信仰宗教的人也许信仰的是祖宗崇拜或民间宗教。不过，即使刨掉民间信仰的成分，信仰中国的五大正式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人口，也有两亿两千万左右。这个数据是不小的，而且根据我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可能实际信教人数更多。

一方面是中国的世俗化，精神生活的世俗化，追求物质主义，另外一方面世俗化的生活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的需求，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宗教复兴。为什么会如此？我的分析是有四个原因。首先，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宗教的控制有所松动，你现在个人信仰什么宗教，只要不是信仰邪教，一般都是容许的。只要你不搞组织，那都是容许的。其次，现在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社会，而成为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个人主义的社会之中，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原来传统的纽带已经断裂了。但人毕竟是群居的动物，他需要这种纽带，宗教就扮演了这种角色。第三，市场社会打破了过去人们确立的生活秩序，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得人们对未来、对个人的命运难以把握。冥冥当中似乎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在主宰着自己，所以他们只能祈求一种超越的力量能够对自己有所庇护。最后，社会核心价值的失落产生的信仰危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反弹，人们重新渴望获得价值和行动的确定性。而各种宗教所具有的终极价值，给人们一种明确的人生意义。如何评价这一宗教复兴？时间差不多了，如果待会有提问的话，我会再补充。谢谢各位。

○座長 いろいろとコメントしたいこともありますが、続いて張玉林先生、タイトルは「中国の環境戦争と農村社会—山西省を中心に」です。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中国の環境戦争と農村社会—山西省を中心に」 張玉林（南京大学）

大家好，我今天想与大家交流的主题是，我们如何看待三十年来中国改革的代价，以及代价的分配。我本人不是做政治学研究的，我是一个农村社会研究者。但是我觉得这是政治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议题，我本人在这方面也有所涉及。当然，重要的是当我们梳理这些代价的时候，要追问代价是如何制造或者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在两年前的一项研究当中也做了初步的梳理工作。那

项研究是一篇论文，题目叫《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与中国农村的环境冲突》，中文版发表在中国国内，日文版在加加美先生今年编辑出版的一本文集里面也收录了，有兴趣的同行可以参考。

在我看来，中国式的工业化，中国式的发展在本质上表现为在自己的国土开展的一场对自然的全面战争。一般来讲我们都用危机或者说环境危机来形容中国目前的环境状况，我在两年前也基本上